

# 千里行军践初心

## ——记中国共产党办学于云南的第一所军事院校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校址,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于1949年6月创建于江西南昌,1950年3月办学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内。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办学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校风;“培养人民解放军现代国防军事政治干部”为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培养目标。1949年7月20日,在江西南昌莲塘镇伍岗(原南昌乡村师范学校),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校长兼政委陈赓作了讲话,勉励首期学员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好传统、好作风,使自己成为一个忠诚的、勇敢的、守纪律的革命军人,并为首期学员题词——“努力学习革命知识,锻炼身体,为人民服务,为争取全中国的解放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有这么一所军事院校,它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之中,创建于江西南昌,办学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内,这便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它是中国共产党办学于云南的第一所军事院校,继承和发扬了红大、抗大

### 讲 述

## 开国少将与老区群众书信中的鱼水情

“我在福州,心在山区、老区,经常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红军军,存放着一封开国少将刘永生1967年3月写给平和老区的回信。回信的背后,是一段鱼水情深。

平和县地处闽粤边陲,是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9月的一天,芦溪镇弄猴村村民陈良文、陈方邻叔侄夜宿山上草寮。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良文开门一看,是三个衣衫襤褸的陌生人。

一阵寒暄,陈良文得知,来人正是时任闽西红军游击队队长刘永生、警卫员罗炳钦和战士江阿岩。原来,刘永生带领闽西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西南,在湖雷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建设云南作出巨大贡献。

### 部队打到哪里 学校就办到哪里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解放南昌后,兵团党委根据上级指示要求,作出“关于成立军大四分校的决定”,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为校级单位,归兵团直接领导,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校长、政委由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兼任。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南昌创建后,首次招收学员930人。一批文化程度较高、没有当兵经历的地方知识青年、学生、老师等成为首批学员。经过政治理论学习与千里行军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教育,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圆满完成了把地方知识青年转变成信念坚定的革命军人这一历史使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解放全中国,党中央发出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号令。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向前推进,部队打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边行军、边学习、边战斗成为学校当时办学的主要特点。历时7个月零6天,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胜利完成了向大西南进军的任

务。随着云南解放,1950年3月,全校师生到达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并在此办学。

### 培养学员 为建设大西南作贡献

学校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后,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计划进行正规训练和教育。由于当时云南刚解放不久,匪患严重,人民政权建立,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及其军官的任务繁重,加之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复杂,邻国战场硝烟弥漫,海军、空军组建需要大批经过锻炼的知识青年。于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云南招生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便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

1950年5月,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举行首期毕业典礼。校长陈赓勉励学员要把在学校学到的革命知识和受到的锻炼运用到工作中去,为部队、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作出贡献。同时,他还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概括的西南地区党政军群面临的“三大任务”:第一项任务要把九十万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改造过来;第二项任务要把西南各省六千万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发展生产;第三项任务要把二野和西南军区所属六十万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变成工作队,帮助地方建立和巩固政权,搞好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西南地区的党政军群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管理好大西南,建设好大西南,保卫好大西南。毕业分配时,学员们纷纷要求到边疆去,到战场上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多次更名 推进正规化军校建设

奉中央军委的命令,1950年5月,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改称“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隶属西南军区。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的延续,校本部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内,校长、政委仍由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兼任。这一时期,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主要任务是教育改造国民党

起义官兵。

改造结束后,按照量才录用,各得其所的原则,除将级军官少数留在部队任职以外,多数集中到云南军区统一安排。后来,有的将级军官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正副厅长和省、市军政参事室参事等职务,有的校尉级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士兵中有的入了党并被提拔为干部。

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完成历史任务后,按照第一次全国军校会议和军委关于将各大军区军政大学及分校改编为步兵学校的指示精神,军校又先后更名。

1951年2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奉命改为“云南军区初级步兵学校”,同年4月,云南军区初级步兵学校又按照全国军校统一的序列,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1952年7月,西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召开学校整编工作会议,确定以第五步兵学校为基础,将贵州的第七步兵学校之大部合并到第五步兵学校,并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化院校建设,使学校成为模范部队。

1955年5月,国防部部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更改校名后继续沿用原第三步兵学校编制体制。1956年9月,军校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北校场迁出。此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不再办学。

从“历史名校”到“红色军校”,从“革命熔炉”到“忠诚于党”,从军事学堂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防教育基地,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每个办学时期都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办学风格和军事思想,也孕育了深厚的革命教育、建设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见证了近代中国革命救国的艰难历程和现代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我们应充分用好这个红色基因库,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摘自《云岭先锋》文/杨竣 任传振 张玲玲 方世凯)

遭白军发生激烈战斗。战斗中,刘永生、江阿岩负伤,正一路躲避敌人的搜捕。闽西红军的英名,叔侄早有耳闻。陈良文当即安排侄儿煮饭、采摘草药,用米汤加上捣碎的青草汁给伤员处理伤口。数日后,陈良文又费尽周折,请来民间骨科医生为他们疗伤。伤愈之后,刘永生提出要在侯山建立根据地,在坝心林埔建立交通联络站。陈良文叔侄主动要求担任交通员,在闽西交通员陈凤麟的带领下,担负起侯山根据地通讯联络的职责。

此后,陈良文的几间草寮就成了这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落脚点,游击队伤员疗伤、休整的“后方”。红军给陈良文购买物资的钱张张崭新,每次去购买物资的时候,陈良文都把钱反复揉搓,或用木炭、泥

土沾染后,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店铺零星购买,再趁夜深人静用装木炭的袋子悄悄挑回草寮……像陈良文这样,用不同的方式和身份,支持红军的不在少数。

1935年6月初,闽西南九团小分队在芦溪镇双峰村遭遇国民党地方民团伏击,只得迅速向漳汀村转移,准备到永定与刘永生部队会合。小分队抵达漳汀河时,原河面的简易木桥已被暴涨的洪水冲毁。追击兵咬不放,情况万分危急。“快,赶快!救红军去!”得知红军过河受阻,群众纷纷赶来帮忙。水势湍急,木材架上桥墩就被水冲走,漳汀村苏维埃主席陈加定连忙召集了四十多个青壮年用肩膀扛着木材下到水里搭桥。无法正常通过的伤员,漳汀村民就让他们坐在打稻谷的桶里,群众有的推、有的拉、

有的扶,总算让伤员全部过了河。红军过河后,群众又迅速推掉木板桥,阻碍追兵。得知此事,时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刘永生承诺:“待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在漳汀河上建造一座红军桥。”

1959年,在刘永生的关怀下,一座宽3米、长70多米的大木桥横跨漳汀河两岸。几年后,一次山洪把木桥冲垮。得知消息,刘永生马上协调各级老区办拨款,于原址重建大桥。这座桥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红军桥”。

为感谢刘永生对老区群众的关心,陈良文等人请人代笔向将军寄去书信。刘永生回信,鼓励老战友们要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文/杨特团 周艺贞)

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 培训中国军医人才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林可胜领导下的救护总队对共产党的支援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被指控为“亲共”。蒋介石责怪林可胜“左倾颇甚”“阴助延安”。1942年,林可胜辞去救护总队队长职务。同年,由于在中国生理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

1944年年底,林可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医署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创办国防医学院,大力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1946年,沈其震随叶剑英赴北平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代表团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得知林可胜正在北平视察军医工作,沈其震向叶剑英请示去看望林可胜。叶剑英当即批准并表示:“像林可胜这样同情我军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队里比较少见,我也应当去拜访他”。双方会面后,叶剑英对林可胜在抗战时期大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表达了敬意与感谢。

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因患食道癌逝世,终年72岁。2021年9月10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其新命名的“可胜大楼”揭牌,此举不仅是向林可胜在中国生理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致敬,更是因为他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自《学习时报》文/杨娜)

## 晋察冀边区如何落实党的减租政策

减租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基本政策,也是抗战后期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1943年至1944年,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普遍、认真、彻底地实行减租的部署要求,聚焦巩固发展根据地,结合减租斗争形势,稳步抓好工作落实,持续兴起全面贯彻减租政策热潮。

### 把握基本精神 落实落细政策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借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际讨论通过正式法令《晋察冀边区租佃债务条例》,同时废除之前政府制定施行五年且两度修正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新条例深刻把握减租政策之保障地权佃权、减租交租、照顾双方巩固团结、增加生产以利抗战的基本精神,集成运用抗战以来边区各地贯彻执行减租政策的经验和不足,用大篇幅条文来规定减租政策,比之旧条例规定更管用、更解决实际问题。新条例还十分注重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导作用,创制了村调解与县仲裁、先调解后仲裁的高效解决争议办法,大大增强了减租政策的执行力。

当年10月,边区又对新条例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若干减租事项,尽量堵住政策漏洞减少争议,保证减租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落到实处。比如,新条例规定,地主依约收地致佃户无法生活者,应减收一部分或暂时不收并另定新约。补充规定对此法定原则事项分地地主生活优于佃户而佃户因收地无法生活、地主与佃户生活均能自给、佃户生活优于地主三种情况作了具体操作说明。

### 坚持目标导向 提升贯彻程度

对照“普遍、彻底”要求,边区深刻认识到各地在面上和点上贯彻减租政策程度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必须加紧解决。1943年10月,全面梳理分析各地贯彻减租政策现状,按照贯彻程度分成五种地区。第一种是彻底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农民群众充分发动且既得利益完全巩固,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并保证减租后按契约主动交租。第二种是基本上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农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且既得利益还不够巩固,有个别村庄没有执行。第三种是初步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只是开始贯彻或停滞在开始贯彻阶段。第四种是尚未贯彻减租政策的新开辟地区。第五种是曾经贯彻过减租政策,一度因政权变质致减租政策被取消,农民群众利益得而复失的地区。

与此同时,边区坚持“面上求普遍、点上求彻底”的目标,明确了五种地区下一步提升贯彻程度的具体目标,推动全区域整体提升。在第一种地区,主要是巩固农民群众既得利益,纠正还残存着的减得不彻底、个别现象。在第二种地区,主要是彻底贯彻减租政策,纠正明减暗不减及其他减得不彻底现象,并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第三种地区,主要是进一步贯彻减租政策。在第四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条件时应即有计划地逐步实行减租,首先要做到初步减租,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实行减租条件。客观条件定为村政权已经初步改造,能为抗日服务,群众武装力量能经常进出活动,党和群众组织初步建立。在第五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条件时应即逐步恢复农民群众的既得利益,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恢复条件。

鲜明目标导向指引各地快速找准目标定位和努力方向,至1944年8月各战略区贯彻减租政策程度显著提升。北岳区基本地区(包括一部分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减租政策。北岳、冀中的一部分游击根据地,

过去曾实行过减租,由于被敌“蚕食”,地主曾恢复了过去的租佃关系,现在又重新贯彻了减租政策。一部分游击区(如平北、冀东小部分地区,北岳、冀中的一部分游击区)开始减租。

### 通报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

北岳区是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区,也是贯彻减租政策的示范区。1943年上半年,却在边区所辖四分区的中心地区出现了地主普遍向农民反攻的现象。四分区大部分地区抗战以来所订立的3至5年的租佃契约期限已届满或即将届满,不少地主抓住《晋察冀边区租佃债务条例》规定的“契约期满,出租出佃人得收回其土地”等有益于自己的条文加以强调扩大,乘机违法收地加租,如果农民不肯,即向政府起诉,使农民丧失土地使用权和既得利益。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之后,局部地区地主在执行减租政策上的反攻,标志着减租斗争从斗理斗力进入了斗法的阶段。地主反攻最严重的四分区平山县就发生了2000多件租佃纠纷案。县党政民领导机关在斗法关头表现出无能和无原则的让步,成为北岳区的反面典型。

7月7日,边区刊物《战线》刊登7月2日北岳区党委《关于保护农民既得利益给四分区地委的指示信》,并配发边区领导刘澜涛所作评论《打退地主的反攻,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对平山县地主反攻案例进行详细通报,指出各级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在地主阶级力量被削弱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仅不会停止,而且必然以新的更复杂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训,在贯彻减租政策时必须学会领导与掌握合法斗争,学会援引法令中有利于农民群众的部分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斗法中争取胜利。这次及时的警示教育,既推动平山县、四分区胜利打退了地主的反攻,更为北岳区乃至全边区防范和打退地主反攻、全面贯彻减租政策夯实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干部下沉到村 助力一线攻坚

全面贯彻减租政策是一场攻坚战,村是一线主战场。组织县干部下沉到村,深入宣传解释法令,检查减租实行情形,助力发动与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成为边区一线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举措。

1943年秋收后,十一分区地委组织区干部下沉到所有村,并建立逐户解决减租问题工作机制,迅速掀起了减租与退租运动热潮。一般工作方式是区干部到村中,先召集政民干部会,成立“减租复工委员会”,会后区干部协同对各户进行调查与动员,再根据收集的材料,召集租佃双方开会,提出和解决问题。区村干部分三组进行工作,第一组为评议问题组,由能掌握政策法规的干部组成;第二组为清算组;第三组为订约组。这样由第一组评议,确定处理原则后,交第二组清算照减应退的数字,而后第三组掌握契约年限,订立契约。

面对一部分顽固地主地主的反攻,县干部大力气帮助村里攻坚突破。四分区平山县石炭村过去农民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不敢和地主斗争,因此该村的地主根本不理会减租政策,不但加租夺佃,而且用各种办法来剥削农民。县干部到此村进行检查时,发现地主索债去过贪污粮食60石,首先抓住这个问题来发动农民进行反贪污斗争和索债清算。最后,索债承认错误,退出谷子50石麦子7石。这一反贪污斗争胜利后,农民的斗争情绪高涨,紧接着解决租佃问题,减租政策也很快得到贯彻。

(摘自《学习时报》文/林宁)

## “子弟兵”称谓诞生于晋察冀

著名人士纷纷发来贺电,全国报刊纷纷报道,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聂荣臻率领下展开游击战争。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1937年11月,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游击战争的进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很快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平山团(三五九旅七八团)开赴晋察冀根据地,连战连捷。1939年5月,平山团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取得了著名的上下细腰涧大捷,全歼被围日军。聂荣臻给七八团拟写了嘉勉令《永远保持并发扬平山团的光荣》:“……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大行山上铁打的子弟兵,你们在战斗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你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你们的光荣传统,永远成为军区八路军的模范部队,成为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平山子弟兵。”有研究指出,这是“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1939年夏季,晋察冀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击毙了侵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

(摘自《人民政协报》文/吴小龙)

## 奔走抗战前线的林可胜医生

林可胜,祖籍中国福建,1897年10月15日出生于新加坡,16岁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20年至1924年先后获哲学、生理学和科学博士学位。1924年,林可胜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次年成为该校首位华人系主任。他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主持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推动我国生理科学实现飞跃式发展。林可胜以精湛的医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更为可贵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林可胜毅然放弃安稳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 成立救护总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林可胜临危受命担任总干事。1938年春,林可胜在湖北汉口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出任队长,他改变以往在大城市设置伤员医院的做法,而是派出医疗队深入战区随军救护。过去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轻伤转重、重伤致死的情况大有改进,部队士气大大提升,战斗力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战局日益严峻,救护总队先迁长沙,继迁邵阳,1939年3月落址于贵阳图云关。那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山谷,林可胜与队员们一起平整土地,修建

医院以及材料仓库等。他还积极募集资金和医药器材,在其任内共募得捐款6600多万元,极大提升了救护总队的战地救治能力。救护总队全盛时下辖150支战场救护队,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拥有救护车200多辆,是抗战时期全国的医疗救护中枢。

中国共产党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成立,在救护总队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

1939年,红十字会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明确总支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队长,在医务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十字会书报供应站”,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动员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到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大多数医学专家、医护人员的认可。

### 支援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党支部和总支委员会的宣传动员下,林可胜十分认

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战地救护工作中,除了民族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林可胜也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派遣医疗队,赠予医药物品,有效改善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救护条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年底,周恩来请求救护总队协助八路军开展当地的医疗卫生救护工作,林可胜立即派出第7、第23、第39医疗队带着药品和器械奔赴西北。在陕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第23医疗队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台,无一死亡病例,受到边区政府的高度赞扬。当该队奉命调走时,周恩来、朱德亲自前往送行。1938年,林可胜主动派遣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前往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服务,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同年秋,林可胜亲自带领4支医疗队到延安等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称赞。林可胜还派遣国际援华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柯棣华等都经由他派赴边区服务。

林可胜还积极援助新四军的医疗工作。1937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四军缺少医务人员,此时林可胜正在组建救护总队,他将自己手里志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医生名单交给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沈其震从中挑选了一些有战地救治经验的医护人员,组建起新四军的第一支医护队伍。林可胜还派遣两支医疗队前去支援新四军。这些医疗援助对